

区域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以重庆为例

QUYU FAZHAN YU CAIZHENG ZHENGCHE YANJIU
YI CHONGQING WEI LI

何佳晓 著

区域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以重庆为例

何佳晓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以重庆为例 / 何佳晓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643-5949-2

I. ①区… II. ①何…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 - 研究 -
重庆②地方财政 - 财政政策 - 研究 - 重庆 IV.
①F127.719②F812.7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1879 号

区域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以重庆为例

何佳晓 著

责任编辑	左凌涛
助理编辑	何俊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 品 尺 寸	170mm×230 mm
印 张	13.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5949-2
定 价	6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前言

Preface

区域发展是指一个地区在发展动力的持续推动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为了经济总量和质量不断提升、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进行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活动。根据对区域发展的理解，本书首先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者本身进行了研究。其中，对于经济发展主要着眼对GDP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经济发展等的研究，对于社会发展则根据政府社会职能把研究内容确定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个方面。由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因此本书接着从研究区域发展动力的视角切入，探讨推动区域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培育和发展状况，从而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最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选择绿色发展道路。这也是人类面对当今资源、能源和环境挑战所做出的在发展方式上的必然选择。因此，本书专门对区域绿色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迫切要求、遇到的困难并提出相关建议。

区域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政策，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并对人类发展重要却又受到约束的对象给予扶持。因此财政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区域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政府在宏观配置指导下，一是需要根据区域的情况、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财政政策，以真正满足区域的实际需要，更大程度发挥政策的作用；二是需要根据区域发展各领域的重要程度、公共属性等，分析其对政府支持需要的大小，统筹调配资源，制定政策。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弥补市场失灵，又不能过度干预。因此，财政政策应有差异，在纯公共领域，发挥保障作用，确保人民生活水平；在市场竞争

争领域，则应学会“放手”，注重引导作用，更多让市场去推动发展。

本书从区域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区域社会发展与财政政策、区域创新发展与财政政策、区域绿色发展与财政政策四个方面谋篇布局，基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及其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对区域发展与财政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为了更专注地研究某一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分析除国家层面财政政策以外的地方层面财政政策，本书将研究的地区锁定在以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为基本区情，同时又具有发展活力的年轻直辖市——重庆。

本书力求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相结合，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全面解析区域发展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冀希通过剖析重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现行财政政策的不足，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从而对重庆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需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第三章“区域创新发展与财政政策”的撰写以重庆社会科学院 2017 青年研究基金项目“基于区域创新的重庆政府 R&D 经费配置效率及优化对策”（2017QN-3）为重要支撑。

作 者

2017 年 10 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区域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001
一、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001
二、相关政策梳理及分析	011
三、国外经验借鉴	020
四、重庆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情况	025
五、重庆经济与财政关系分析	036
六、重庆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044
七、促进重庆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对策	046
第二章 区域社会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057
一、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058
二、相关政策梳理及分析	069
三、国内外经验借鉴	077
四、重庆社会治理与财政政策研究——以农村为例	082
五、重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政策研究 ——基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视角	099
第三章 区域创新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115
一、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116
二、相关政策梳理及分析	126
三、国内外经验借鉴	130

四、重庆创新驱动发展及财政支持政策	133
五、重庆政府 R&D 经费配置研究	154
六、重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及财政支持政策	162
第四章 区域绿色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177
一、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177
二、相关政策梳理及分析	183
三、国内外经验借鉴	188
四、重庆生态、环境、能耗与财政支持的基本情况	192
五、典型案例：万盛绿色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195
参考文献	205

第一章 区域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

财政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重庆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家或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始终保持着全国第一，财政政策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重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究竟如何，如何调整财政职能，制定有利于区域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因此，研究重庆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分析怎样有效发挥财政的调控、引导作用，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对促进重庆经济在“十三五”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书将对社会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进行单独的分析，因此本章的“经济发展”主要着眼于对 GDP 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经济发展等进行研究。

一、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一) 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1. 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研究进展

(1)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及研究进展

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基于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均衡。罗森斯坦·罗丹 (1943) 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问题》一文，形成“大推进”战略，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因此要在各个工业部门同时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投资，使各种工业部门都发展起来，才能产生外部经济效益。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先发展和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大发展。之后，纳尔逊在 1956 年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速增长是阻

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此观点与“大推进”论比较相似。

（2）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及研究进展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1950年最早提出“增长极”概念，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缪尔达尔（1957）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并说明由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使核心地区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由此产生和拉大了区域差异。同时，他还用“循环累积因果论”说明了不发达国家经济上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的形成问题。赫希曼（1958）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不发达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源，理论上的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J. G. 威廉姆森（1965）在西蒙·库兹涅茨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实证得出倒“U”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将逐步扩大，但经过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将逐渐保持平稳。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地区差距最终将会趋于缩小。由拉坦·弗农（1966）首创的“梯度推移”理论认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出现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逐步向低梯度区传递，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约翰·弗里德曼（1966）的“中心—外围”论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区域间的不平等开始缩小。

还有很多学者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等理论，对经济收敛性进行了探讨。威廉·鲍莫尔（1986）采用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自1870年以来在16个较富裕的国家间显示了较强的增长收敛性。Robert J. Barro（1991, 1998）利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跨国数据，证实了这种有条件收敛现象的存在。Barro通过对20个OECD

(经合组织)国家资料分析发现,从1960年到1985年这些国家的实际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负相关于1960年的实际人均GDP水平,即基数大的发展速度要慢于基数小的国家;他同时发现美国各州的发展也存在这种规律,从1880年到1990年间各州人均收入增长率也负相关于188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初始贫困的州确实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在1992年,Barro与Sala-I-Martin分别对美国48个州以及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提出“条件收敛”如果允许各经济体之间存在异质性,那么不同的经济体可能具有不同的稳态,一个经济体离其稳态越远其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富裕地区有可能比贫穷地区增长更快,只要其离开自身的稳态更远。此外,还有Avinash K. Dixit & Joseph E. Stiglitz(1977)、Paul R. Krugman(1991,1999)、Hans Gersbach & Armin Schmutzler(1999)、Martin(1999)等所支持的现代企业区位选择论,他们从各方面对企业的区位选择、产业聚集等进行了探讨。

2. 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研究进展

厉以宁、史晋川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开发基本上遵循梯度推移理论及其衍生的各种区域发展模式和点轴开发模式。颜鹏飞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认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20世纪50~70年代)——非均衡(80年代)——非均衡协调(90年代)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以湖北省作为案例,对经济增长极的定位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苏廷鳌、付伟(1999)、曾德超(2005)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李娟文、王启仿在《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一文中,以北京、广东、湖北、西藏自治区为例,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现状及地域分布特点。胥嘉国(2006)利用倒U型发展理论探讨了如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正处于集聚效应小于扩散效应的发展阶段,主张中央政府积极协调区域合作,促进东部地区的优势方面向周围地区进行扩散,帮助中西部地区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财政政策研究方面,17世纪,William Petty指出,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Colin G. Claik

(1940)认为 Petty 的研究符合各个国家产业发展的规律，并且通过实践验证了确实存在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转移至高收入产业的趋势，从而形成著名的 Petty-Claik 定理：随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会由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的形态向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较大的形态转化。此后，库兹涅茨 (1971) 也证实在资本结构方面和劳动力结构方面，农业部门的相对比重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工业部门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处于上升趋势。在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也经历了上述发展趋势。1978—1992 年，第一产业维持在 20%~34%；1992 年之后，第一产业基本下降至 20% 以下，并大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到 2012 年，三次产业比为 10.1 : 45.3 : 44.6，第三产业略低于第二产业；到 2013 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46.1%，超过第二产业。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由第三产业拉动，同时要提高其他两个产业的生产效率 (刘伟，2002)。现阶段，中国市场机制、产业体系尚不完备，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起到独到作用，财税政策调控采用市场手段，通过产业政策、价格信号和规范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公共治理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贾康、阎坤，2002)。但目前我国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一。张斌 (2011) 测算出我国 1980—2009 年产业结构系数，以政府支出、税收、产业结构系数为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政府投资支出和税收对产业结构的变动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于力等 (2011) 认为，我国财政支出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对三次产业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而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支出、支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三次产业的贡献则各不相同，有些甚至阻碍了三次产业的发展。

(二) 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支持理论及研究进展

1. 财政分权理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是以理查德·马斯格雷夫、查尔斯·蒂布特、奥茨 (Oates)、詹姆斯·布坎南等为代表。正如乔治·斯蒂格勒 (1957)、奥茨 (1972) 所认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公众，具有信息优势，从而对所管辖地区的居民的效用与需求等比较了解，能更

好地代表居民偏好，由中央向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马斯格雷夫（1959）、奥茨（1972）证明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对分税制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马斯格雷夫明确地界定了分税制的含义，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也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来供给更好。布坎南（1965）提出了著名的分权俱乐部定理，指出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就在外部不经济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正等于由于新成员分担运转成本所带来的边际节约这个点上。尽管以上几种理论论证了地方政府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方面比中央政府更为有效，但都没有回答人们是否愿意聚集在地方政府周围。针对这个问题，蒂布特在1965年发现选民流动性的重要性，提出了地方支出的概念，并依据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提出了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推到了顶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以钱颖一（中国）、Gérard Roland、Barry R. Weingast等为代表。钱颖一和 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的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从而使得基础设施支出的份额增大，由此得出结论：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较低，中央政府更偏好提供公共品。Weingast（1995）提出分权的三个条件：一是分散的政府对经济有基本的规制责任；二是不存在贸易壁垒；三是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硬化。Remy Prud'homme（1995）、Diana Conyers（1990）、Paul Seabright（1996）认为分散的政府决策可能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尤其是当地方政府的借贷不受约束时，不规范的分权机制可能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地方政府固然具有信息优势，但如果地方政府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该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和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他们指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否有效地使用所掌握的信息，对于地方居民的福利是至关重要的，究竟需要集权还是分权，取决于两者对于福利的影响孰轻孰重。

2. 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1）国外区域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知识、科技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受外溢效应的影响，需要政府干预，且制定有效财政政策促进人力资本投入和刺激企业加强知识的积累。Robert Lucas（1988）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对于理解经济的实际增长过程都是重要的。他认为，经济范围内的人力资本溢出使经济在实现持续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资本深化过程，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不能给人力资本拥有者带来收益，个人在进行人力资本决策和分配时间决策时不会考虑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偏少，进而经济增长均衡将是一种社会次优。因此，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取向就是鼓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保罗·罗默（1986）认为，由于知识只有正的外溢效应，从而知识的社会边际产量与私人边际产量存在差异，因此，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每一竞争性厂商将不会选择社会最优量的知识积累，结果是分散化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帕累托最优增长水平。因此，各种能消除知识社会边际产量与私人边际产量差别、引导私人资源由消费转移到研究的财政政策都可以取得帕累托改进的效果，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具体措施可以是对知识资本的持有、积累或对知识的生产过程提供补贴，并对知识资本以外的其他要素课税，而最简单的方法是政府对厂商所拥有的每单位知识支付一个依时而变的单位消费品的补贴。Robert Knoop（1995）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就美国经济进行了削减转移支付、公共投资、公共消费、政府购买和财政总支出等5种政策实验，发现削减公共投资占总产出的比重为1个百分点，即使同时削减资本税，也会使经济增长下降0.1%，福利减少1.5%；压缩公共消费，如同时减税也可轻微促进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公共消费占GDP比率呈负相关；全面按比例消减购买支出10%降低了经济增长和福利，除非同时削减资本税，经济增长才会不变而社会福利上升。桑福德·格罗斯曼&Elhanan Helpman（1991）认为，由于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而企业在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投资水平偏低。因此，政府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或提供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增加R&D研究与发展投资等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内生增长理论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知识、技术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外相关理论也指出受这些内生因素的外溢效应的影响，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而重庆财政对科技、文化的投入力度仍然较小，需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不少学者在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方面进行了分析。J. R. Miller 和 G. L. Russek (1997) 着重研究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他们利用 39 个国家 1975—1984 年的数据回归，发现对全部样本国家，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取决于其资金来源：通过税收增加来增加财政支出将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国债增加使财政支出增加将阻碍经济增长。Gnellec 和 Brum 于 2001 年所做的一项经济计量学研究中，基于 16 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 1980—1998 年的统计数据，对不同类型的 R&D 投入对多因素生产率增长的长期影响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企业 R&D 经费、公共部门 R&D 经费和国外 R&D 经费每增长 1% 分别带动生产率增长 0.13%、0.17% 和 0.46%。A. Charens, W. W. Cooper & E. Rhodes 等人 (1978) 首先提出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即数据包络分析)，使用线性规划理论和模型研究经济学中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的有效性，之后很多学者利用 DEA 来对经济发展绩效进行分析。Paul Cashin & Ratna Sahay (1995) 通过分析印度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印度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了其地区经济收敛的结论。Garcia Mila、Therese J. McGuire (1996) 比较了欧盟和西班牙中央政府对十七个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指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没有起到改善落后地区经济的作用。Shantaanan Devarajan、Vinaa Swaroop & 邹恒南 (1996) 也在其文献中说明了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意义。Tsui Kaiyuen (中国香港) (2005) 考察了县级财力不均等的变化趋势及各收入项目对财力不均等的贡献，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财力均等化效应。

还有一些学者国外学者对自由港等的研究较深入。自由港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理查德·S. 托曼所著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较早定义了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概念。赫希曼 (1945) 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自由贸易港区，实现与国际经济体制和管理的接轨，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内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对全国各地起到示范作用。缪尔达尔 (1957 年) 则持相反态度，批判了自由贸易港区这种特殊经济形式，认为设立自由贸易港区会阻碍区内与区

外贸易和资源的流通，增加地区差异，总体上看来得不偿失。Madani Dorsati (1998)，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区的情况，认为区内的本土及跨国企业能享受灵活的就业、税收等优惠政策，出口加工区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出口加工区只是一种次优的政策选择，其作用有限，只有优化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才能真正促进区域内外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Mary R. Brooks (2004 年) 分析了港口及国际航运的结构治理问题，指出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随着港口功能的拓展和港口所有权的变迁，世界各地的港口治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这对港口腹地的开发建设过程会产生深远影响。国外学者对保税区、自由港等有了丰富的研究，但未能针对中国国情对保税港区进行研究。

(2) 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随着我国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少学者将视角落在了财政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上。

张林 (2016) 认为，地方政府实施财政激励手段的基础是财政分权，只有地方政府拥有一定财政收支权力的时候才能有效实施各种财政激励手段。财政激励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投资、政府购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各种财政专项经费支出和财政奖励等。肖育才 (2010) 指出，财政政策从投资、人才流动和技术创新三方面形成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针对目前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缺失，应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古炳玮 (2010) 对有利于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大力发展经济，壮大财源；加速实现工业化，为财力提高奠定坚实基础；优先发展北部湾经济区、资源富集区、西江经济带的经济布局；严格控制行政管理支出，财政资金重点用于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的思路。陈艺华 (2010) 对促进广东省各地区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认为可设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或“区域协调发展基金会”，或类似的区域开发的统一协调机构或基金会，以协调政府部门开发欠发达地区的工作，并通过集中掌握开发基金，负责开发计划的落实执行。

部分学者研究了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陈

健（1995）分析了实行分税制改革、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的重要意义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张孚路、权甲戌、柳荫、王璋（1997）指出我国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困难，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要建立起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加快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曾军平（2000）、刘溶沧和焦国华（2002）分别通过对1994—1997年、1988—1999年我国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实证研究得出，虽然其发挥了纵向平衡效应的作用，但横向平衡效应却没有得到体现，甚至有拉大横向差距的趋势。陈秀山、张启春及马栓友、于红霞（2003）分别对我国转轨期间和1995—2000年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区域均衡效应进行了分析，也证实了财政转移支付不但没有使我国区域经济出现收敛，反而扩大了地区间差距。龚六堂、邹恒甫（2002）对多级政府下的政府花费、税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黄广肖（2005）通过对1953—1998年不同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框架下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抽肥补瘦”式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只能在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中得到实施，地方财政分权只能局限于地方公共产品供应范围内。罗辉、赵永旺（2005）从县域经济的视角提出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促进我国县域经济有序发展。曹俊文、罗良清（2006）对我国1996—2003年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分析后得出三条结论。一是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均衡地区间的财力水平差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均衡的局面未被完全打破。二是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考虑并且区分了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并对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实施倾斜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缩小了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财力差距。三是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未能有效地降低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市之间财力水平的差异，特别是西部地区。赵霞、陈学志（2007）指出我国的东西部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都严重失衡，并以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切入点，对造成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及如何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促进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探讨。江新昶（2007）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发展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财政转移支付在地区间的分布具有“马太效应”，越是富裕的地区，得到的财政转移支付量越多，财政转移支付没有发挥缩

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作用。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全国的视角，还有一些学者专门对我国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探讨。余小平、吴雪、张文红（1997）研究了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及投资政策对地区发展的影响，认为需要打破西部贫穷却税负重、东部富裕却税负轻的不合理局面。刘蓉（2001）分析了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状况和存在的弊端，从目标选择、模式选择、近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案设计、加快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讨论了应如何构建促进西部开发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问题。陈志勇（2001）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和西部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在对各国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作了比较后，提出了需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思路以促进我国西部经济的发展。程骏（2001）通过对我国西部实际情况的分析，针对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高黎、聂华林（2007）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存在收支矛盾突出、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以及与东、中部县乡财政差距较大等问题，并针对西部地区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环境与制度缺陷，提出应改革我国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建立起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国内学者对保税港区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近几年。刘伟（2005）对港口的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用具体的系数和指标进行了评价，并对一体化保税港区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刘遵峰等人（2007）指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需要拓展保税区的经济功能，发展保税港区，更好地发挥港口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促进腹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并促进我国国际航运中心的崛起。崔婕（2008）探讨了保税港区适合发展的业务模式，从出口分拨业务及跨国采购业务、进口分拨业务、国际中转业务、国际集拼装业务、专业保税商品交易市场、国际维修、保税展示服务七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吴俊、刘碧云（2008）提出了我国保税港区第二轮发展的思路，强调应注重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走专业化道路，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初级产品现货和期货交易中心，设立粮油等基础农副产品的仓储、交易和物流中心等。曹艳文等人（2008）对我国洋山保税港区、东疆保税港区、大窑湾保税港区、洋浦保税港区、苏州工